



滇史论丛

滇史论丛

第一辑

方国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文俊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滇史论丛

第一辑

方国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1,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0

书号 11074·476 定价 (七)1.25元

自序

(略述治学经历)

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读书小学、中学时,常促居小屋,终日伏案伊唔。稍长,自署书室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假日,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者六年,未尝有佳作。将远游,先生临别赠言,诵《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谓: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此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矣。

公元一九二三年至北京升学,多闻议论,胸襟开扩。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因一场大病,休学二年,复学读本科。时“整理国故”之风甚炽,乃习考据学。先后从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马衡(叔平)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且得高步瀛(阆仙)、吴承仕(检斋)、黎锦熙(劭西)诸先生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每有论述,发表于期刊,亦有存稿(有可取者,已编定《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学斋杂著》五种)。又先后从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诸先生治史地之学,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且多读西域、南海译著,增益新知,亦有述作。至一九三三年,已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催促瑜回乡习纳西族象形文字。秋间过昆明,获晤袁嘉

殷(树五)先生,询所学,蒙赞许,纵论滇人旧学,亦颇谓然。时周钟嶽(惺甫)、由云龙(夔举)、赵式铭(星海)、方树梅(瞿仙)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既至丽江,习纳西文字成。次年复过昆明,携《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六月至北平。数日,刘半农先生病歿,将整理纳西文字,无从请益。友人董作宾(彦堂)介绍至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居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甚富,得纵览之。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善本书,时往假读,约一年间,辑录云南地方史资料。是时,有中、英会勘滇缅未定界之议,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多作文议论,发表于报刊。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谒章炳麟(太炎)先生求教。复谒李根源(印泉)先生,以云南史请业,颇蒙教诲,谓瑜所论界务多空洞,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乃以参与界务交涉。一九三五年九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于一九三六年夏归至昆明,因袁树五先生强留,教读于云南大学,至今已四十又四年矣。其初,授课之余,致力研讨云南史地之学。自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续修之职。分纂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目,其余多参加讨论。又协助李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有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瑜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瑜研究云南史事已有集稿,拟作专书;然分目既多,颇感芜杂,成稿者尚少。

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

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此乃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服务,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叙传》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用“外”、“别”、“殊”之贬辞,历来史籍如此。故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亦甚少。至近世始稍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史地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慨愤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抗日战争期间虽有述作,成就亦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亦大改观。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是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数十年间积稿虽多,发挥新意而大都未惬于

怀,且近岁已体力不及,盖瑜五岁时因扑地,右眼受外伤,从此,两眼红肿,视力模糊,深受其苦。二十岁至北京获治,恢复正常,至六十岁老眼衰退,有加无已,七十岁已甚严重。出外求医无效,中西医皆言将继续恶化以致失明,但尚有三、五年可用。念此生勉力治学,已有积稿而未经编定,将至一无所成。乃自一九七三年春清理、改造旧稿,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誊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种,共四百余万言。其数量较多者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滇史论丛》。前二书已有条贯,分题考之、说之,而《滇史论丛》尚未竟业。《论丛》率为散篇旧作,有专篇、专条及专书之部分可取者,其中多已发表于期刊,或刻印散发,亦有未刊手稿,已誊写约百万字,将分辑编定。今看书写字极感困难,期得他人帮助整理,继续编入。

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搜集整理,分析批判历史资料,揭示历史真相,仍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云南地方史之研究亦应大有作为。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同道共商,拟定八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顾此科目,原是底子薄,且以往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他科学处在更落后阶段,须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使有志于此者得到充分利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长期共同奋斗,发扬而广大之,非仅一人一时之事也。瑜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勉勉从事。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矣。

公元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丽江方国瑜谨识,时年七十有八

目 录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1
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	17
试论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	28
南中地方势力与蜀统治之争夺及相互利用·····	58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	75
两晋、南北朝统治宁州与地方势力的争夺·····	85
滇东地区爨氏始末·····	100
史万岁南征之石门关·····	139
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	147
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	152
古涌步之位置·····	176
步头之方位·····	186
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	200
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派二、三事·····	217
滇池水域的变迁·····	234
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	246
跋王宗载《四夷馆考》·····	281
晚明时期云南的反明斗争到反清运动·····	286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一 中国历史的范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①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范围。在编写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明确中国历史的范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有确定了哪些地区、哪些族别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界限划清楚了，才能正确处理历史事件。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打破旧的传统观点的束缚，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

吴玉章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作《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对中国历史的范围问题，就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说：“我们讲中国历史，应该是包括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事实上，所有的旧历史材料和历来的习惯，都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历史。……并且存在着许多民族歧视的偏见。……现在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虽然材料很少，事实上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要照这个目的作去。”^②改造旧传统的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祖先，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友好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五八四页。

② 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排印本，第九四页。

合作,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创造和发展了祖国历史。中国历史应该是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把汉族以外各族人民的历史,只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录,甚至划在中国历史之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而历史学家为统治阶级服务,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是极端荒谬的。我们要严格批判这种观点,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应该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摆在当前历史学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一九三四年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其《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这是第一。在这本书里,苏联各民族的历史不脱离欧洲历史,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①这样的原则,对中国历史也是同样重要的,中国历史应该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解放初期,史学界讨论中国历史的编写,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认为编写中国历史,“应该把汉族历史的研究,联系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③照他们的意见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处理历史事件是正确的,因为这样

①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附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九三页。

② 见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原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已编入《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八二页。

③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已编入《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三页。

做才符合历史实际。

近年以来,讨论中国历史的范围,也有许多人发表了意见,认为:“中国史,应该是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以及这个疆域内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都是应该讲述的对象。”^① 认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部历史,要在中国史范围之内,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孙祚民在《论中国古代史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中说:“从今天角度来说,凡处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的所有民族,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成员,它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意见是很对的。但是孙祚民又说:“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则应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为凡在当时还处在各该王朝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该包括在当时中国范围以内,在当时它们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② 这就把王朝史当作了中国史,而且除了王朝史以外似乎就没有中国史的领域了。因此有十多位读者提出意见,大多数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许多兄弟民族都是这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决不能因为他们不曾处于当时汉王朝统治之下,或曾建立过与汉王朝并存的独立政权或国家,就把他们算作外族或外国,而排斥在当时中国疆域之外。”^③ 孙祚民再论这个问题,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了一些补充^④。这是中国史上关系重要的问题,应该深入讨论,来求得正确的见解。

① 见《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② 载《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

③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等问题的来稿综述》,载《文汇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④ 《文汇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

中国历史的范围问题，要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史里要叙述哪些史事的问题，还有认清内外界限的问题。代表儒家思想的公羊派，所说春秋微言大义的“异内外”，是自来历史家看得很重的。我们所得到的历史记载，大都是以王朝统治者的观点来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所谓“尊王攘夷”的内外界限很突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要严格地批判旧的反动历史观，不惟要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写在中国历史之中，而且要写在中国历史之“内”，不能见“外”，这是要充分注意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我国历史上，除去早期的个别情况外，各部族、部落或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国内性质的，某些敌对政权彼此间的矛盾乃至战争，一般说来，也都是国内性质的”^①。中国历史上不在王朝版图之内的民族关系，应该放在中国历史之内来处理，不能以异国的关系来处理，并彻底改变旧观点的书法。

我认为历代王朝史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某一王朝的历史，可以王朝统治势力所及的疆域为范围，也可以王朝的兴亡为限断。前人编写的断代史，不论所谓正史或霸史，都是以王朝统治势力所及的疆域为范围，并以王朝的兴亡为限断，把它作为一部王朝史看待。但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兴亡，并不等于中国的兴亡。在旧的王统观点，以王朝代表中国，称王朝为国朝，王朝史为国史，以至受王朝赏识称为国恩，忠于王朝而死称为殉国等等，所谓“国”是指王朝，并不能代表中国，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为国土范围，则“历代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②，将至某些地区的历史，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岂不把

① 见吕振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原载《民族团结》一九五八年第四期，已编入《史论集》，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三〇页。

② 孙祚民所说。

这些地区的历史斩断，如何能作系统的阐述呢？如果认为王朝史就是中国历史，则在分立为几个王朝时期，岂不成为几个中国了吗？只知有王朝历史，不知有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如何能写成完整的中国历史呢？

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部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

二 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治而言，即由一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统一，由几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不统一。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秦朝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统一是正常的情况。但也有过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金与宋的分立，形成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这些时期，破坏了统一，但没有破坏了整体；不论是统一政权与不统一政权的建立，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为中国的历史。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很清楚的。

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由于历史的具体条件，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没有改变了整体。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一个整体之内的政权分合，并不是整体的破裂与复原。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虽然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旧历史学家对政治情况看得很重，但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历史始终是一个整体。当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时，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整体遭到了分裂，于是有所谓正统之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① 历史学家处理同时存在的几个政权，只承认一个政权为正统，其余为闰位。虽然各家的主张有不同，只承认一个政权为正统则一。如三国之世，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南北朝之世，司马光《通鉴》以南朝为正统，皇甫湜主张以北朝为正统^②；而王通《元经》则晋、南朝宋之后以魏、周为正统^③。各家从王朝的继承立论，不同意见，争持不休，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但其用心，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承认一个王朝为正统，其余则为地方割据的政权。自欧阳修作《正统论》以后，章望之有正统、霸统之说^④，方孝孺有正统、变统之说^⑤，余如苏轼^⑥、修端^⑦、扬维桢^⑧ 诸人都作了讨论，各有主张。其立论共同之点，在分立政权时期，虽各自称王、称帝，建号改元，是对立的；但不承认对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只承认一个政权为合法，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正统论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观造说，而是中国历史纪录也反应着。当政权分立时期，每一个政权都在图谋统一，自命为正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六。

② 《皇甫持正文集》卷二《东晋元魏帝正闰论》之说，洪迈《容斋随笔》卷九有辩论。

③ 《元经》卷九宋昇明三年后，书魏太和四年，阮逸注作解说。

④ 章氏作《明统论》，见苏轼《正统论》征引。

⑤ 《逊志斋集》卷二，有《释统》三篇，《后正统论》一篇。

⑥ 《东坡集》卷二一有《后正统论》三首。

⑦ 《元文类》卷四五《辨宋辽金正统》。

⑧ 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引全文。

统,而斥其他政权为“伪”。南朝诋北朝为“索虏”,北朝诋南朝为“岛夷”。这当然是一种自尊之偏说,但反映出中国是一个整体,不容分立,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通鉴》卷一五七载梁大同三年,南北通好,南使至邺下,北使至建康,皆为之倾动。陈垣先生《通鉴胡注表微》说:“盖当时南北皆华人,强分裂为二国,使不得相闻问,事之至不自然者也。一旦通使,则畴昔衣冠之族,皆可借此得消息,朝市乌得不倾动乎!”^①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历史学家必然要承认这一事实,所以处理历史事件有正统之论,来“合天下之不一”,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着。中国历史发展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统一状态呢?范文澜先生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说:“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总是以统一力量取得胜利而结束。”^②这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提出: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封建王朝之所以对各族进行统治,并不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是决定于汉族与各族人民的联结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但由于王朝统治者与各族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经常的,各民

① 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九四页。

② 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已收入《汉民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页。

族地区有时在王朝统治之下,有时不受王朝统治;但汉族与其他各族人民的联系并不因此而改变,仍然是相互依赖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存在着作为整体的联系。所以有时某些族虽然也建立过政权,但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从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来说,始终是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没有脱离了整体。

如上所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过若干次的政治不统一,出现过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各自称国的情况,但是它们也还是在中国版图之内,同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在内地是如此,在边地也是如此。当中央王朝强盛时,其统治势力达边远地区,当中央王朝衰落时,边境统治者建立政权,他们虽与中原王朝有联系,但各自称王。因此,边境地区有时在中原王朝统治之下,有时为中原王朝统治势力所不及,但不论政治情况如何,边境与内地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共同发展历史,并没有改变。与内地同时有几个政权存在的情况一样,如果只把内地分立王朝的历史认作是中国历史,而把边地所建立的政权的历史认作“外族和外国”,“就不应该包括在当时中国范围以内”,这是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国,就势必割裂整体历史了。这种作法,是不符合中国各族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以祖国西南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在各时期不同。秦时开道置吏,西汉设为郡县,延至南朝爨氏称霸,隋代、唐初复设州县。天宝以后蒙氏割据,后经郑、赵、杨、段、高诸氏更替,到元代复设行省。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内,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外;如果只从王朝版图来决定,则西南各族的历史,将至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如此“变更伸缩”,不惟西南各族历史发展过程不能系统的阐述,也破坏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只有把西南各族历史始终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包括西南各族全部

历史,才能把西南历史讲得清楚。从历史实际来看,必要如此处理。

记载国内少数民族的史事,司马迁《史记》首创专篇叙述的体例,注意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各有具体情况,这样处理是适当的。而且司马迁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比较公正,以对西南夷来说,他在《自序》中申述:“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传》。”说明西南夷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把这区域的事迹录为专篇。这篇《西南夷列传》的次第,列在《公孙弘传》与《司马相如传》之间,即因这几篇传的事迹有关连,这样做也是适当的。但后来有民族偏见的人不答应,如赵翼认为这是“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①,认为朝臣与“外夷”不能相提并论。班固作《汉书》就把记载少数民族事迹的专篇,都置于列传之末,成为附载。并且他在《叙传》里说什么“西南外夷,别种殊域”。而西汉时期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也录在《汉书·地理志》中,明明是汉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而说作“别种殊域”,这样的提法是荒谬的。有严重民族偏见的人,对少数民族不论在王朝版图之内与在王朝版图之外都被歧视,是大民族主义在作祟。他们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阐述中国历史,要严格批判这种错误观点。

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时不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仍然是紧密的。在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不待多说。即以政治联系来看,没有断绝,地方统治者也不认为脱离了中国,从许多事实可以说明。爨氏统治时期,其家族自相承袭,但仍奉南朝的正朔。这时所立的碑记,有纪年号者,如大

^① 《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编次》。赵翼还说:“次第皆无意义。”高步瀛先生《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有“列传次第非无意义”条已辨之,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一期。